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结构性因素

李 若 建

本文分析了单纯利用外来人口迁移理论解释中国农村劳力外流问题的不足，通过对1956年及1989年两次农村劳力外流的比较，作者认为应该从结构性因素的分析入手解释中国农村劳力外流问题，并着重分析了影响农村劳力外流的土地关系与宏观经济波动两个结构性因素。

作者：李若建，男，1956年生，理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中国农村劳力外流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到1989年达到一个高潮。1989年初，大批农村劳力从四面八方涌向经济发达地区，仅广东一地，最高峰时每日涌进10多万人，至1989年2月下旬已达250万人以上。^①对于这一现象，新闻媒介又重新启用了—个久被遗忘的称谓——“盲流”，报刊上许多文章纷纷对此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不少对策。

“盲流”是一个不适当的称呼，因为那些从农村外流的劳力的目标并不盲目，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找工作、挣钱。正是由于新闻媒介在1989年重新启用一个50年代初的旧名词“盲流”，使笔者意识到，任何对1989年大批农村劳力外流的研究都不能割断历史，把问题的解释局限在1989年前后的范围内，而应该从问题的表象去寻求实质。

一、人口迁移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力外流问题的解释及其局限性

人口迁移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1）迁移规律论；（2）社会变动论；（3）劳动市场论。从这些理论出发去解释中国农村劳力外流问题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没有一个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所以又都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1）迁移规律论

迁移规律论的代表人物是人口迁移理论的鼻祖雷文斯坦（E·G·Ravenstein），早在1889年他就列举了七条人口迁移规律：

1. 迁移率与迁移距离成反比。
2. 迁移是分阶段进行的。
3. 每个迁移流都存在一个反向流。
4. 净迁移人口通常都存在一个反向流。
5. 女性在短距离迁移中占优势。
6. 技术和通信发展增加了迁移量。
7. 经济是影响迁移的最重要因素。

1966年，李（E·S·Lee）在雷文斯坦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关于迁移规模、流向、迁移者

^① 《中国百科年鉴1990》第59页，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特征的19条假设,产生了很大影响。^①

如果把中国农村劳力外流的情况与雷文斯坦和李的观点加以对照可以发现,中国的情况与他们的观点大体相符。例如,1989年初流入广东的外省劳工中,来自邻省湖南和广西的占45%。证实了距离越近迁移率越高的假设。^②然而迁移规律论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的归纳,并没有提供理论解释。

(2) 社会变动论

社会变动论的基本出发点是把人口迁移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研究。彼得逊(W·Petersen)提出了从远古到现代各种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作用下的迁移模式。^③泽林斯基(W·Zelinsky)把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和人口转变过程与迁移类型、方向、规模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提出了“人口移动转变过程”。^④按泽林斯基观点,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发生在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早期阶段,在这一时期里经济中心和外围的差别出现,现代化从变革中心向外围扩散,人口的再生产处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自然增长率时期。

社会变动论很明显地是根据西方社会的情况提出的,因此很难将其照搬照套用以说明中国的具体情况。再者,社会变动论是一种宏观理论,很难用来解释某些具体事例,而只能来说明一种大趋势。

(3) 劳动市场论

经济因素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因素,所以劳动市场理论是人口迁移理论中最活跃的部分,也是在近年农村劳力外流研究中常被引用的理论。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分析几种较有影响的理论。

1. 推拉理论。推拉理论是最古老的劳动市场理论,该理论虽然受到各种批评,但是仍被广泛引证。该理论认为迁移是由于迁出地对迁移者的生存与发展不利因素形成推力、迁入地对迁移者的生存与发展的有利因素形成拉力,两者形成合力而造成人口迁移。古典的推拉理论主要强调劳力迁移是由于迁入和迁出地的工资差别引起的,并从一般均衡的观点出发认为人口迁出地由于劳力减少而引起工资上升,迁入地则由于劳力增加而工资下降,最后迁入与迁出地工资相等,达到均衡,这时劳力流动停止。由此该理论受到广泛批评,其中一种批评是,个人不可能真正自由地选择工作。^⑤

有人将推拉理论更进一步用下页表来表示。^⑥

可能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他们的推力因素主要的是农村的低收入和劳力过剩,他们的拉力因素就是更高的收入。如果要用推拉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村劳力外流,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真正的自由选择迁移是否存在,这一点已经被许多研究所否定。第二个问题是推拉理论强调了个人动机,而忽略了个人动机是受控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之中,正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迁移者的选择机会,也影响了他们的选择。

2. 期望收入理论。由于推拉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里虽然有大量的失业人口,仍然有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例如1989年初广东劳动市场已饱和,仍然有大批

① I·A·Kosinski:《People on the Move》.Harper, 1975, p.9.

② 同①。

③ W·Petersen:《Population》.Macmillan, 1975, p.327.

④ 同①, p.10.

⑤ J·Jackson:《Migration》.Longman, 1986, p.17.

⑥ A·Brown:《Internal Migration》.Academic, 1977, p.100.

决 定	潜 在 代 价	潜 在 利 益
迁 移	迁移代价因素： 1. 迁移费用 2. 原有地质和习惯丧失 3. 找工作问题 4. 对陌生人歧视	迁移拉力因素： 1. 更高收入、更好的职业 2. 更好的生活条件 3. 为自己和孩子更好的教育 4. 更好的社会环境
不 迁 移	迁移推力因素： 1. 找不到工作 2. 工作不合适 3. 对当地社会不满 4. 对家庭不满	迁移的互相影响： 1. 熟悉的生活环境 2. 良好的家庭与社会关系 3. 社会地位 4. 保证就业

外来劳工涌入。对此托达罗 (M·P·Todaro) 提出了期望收入理论, ①该理论认为迁移者将选择迁往能获得最大期望收入的地点。如某人在农村年收入为1000元, 如果他在城市能找到工作的话, 年收入为2500元, 而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概率为0.5, 则其期望收入为 $2500 \times 0.5 = 1250$ 元, 高于他在农村的收入, 虽然他在城市里不一定能找到工作, 但是他还是会到城市去。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村劳力流向城市是经常发生的, 甚至是不间断的, 其主要原因是: 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及获得城市工作的可能性。托达罗认为城市里存在二重劳动市场, 一个是正式劳动市场, 另一个是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工作的非正式劳动市场, 这些市场的工作主要是笨重的体力工作。②

用托达罗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村劳力大批外流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中国的城乡差距十分大, 以1989年为例, 农民人均纯收入602元,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261元, ③农民的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47.7%。在悬殊的城乡收入面前, 稍有机会农民就可能外流。对于托达罗理论的批评之一是该理论只是推拉理论的翻版, 笔者认为这种批评是正确的, 因此用该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村外流问题的不足之处也是过分强调个人动机, 忽视社会结构因素。

3. 二元经济论。刘易斯 (A·Lewis) 提出的二元经济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推拉理论和期望理论在宏观解释上的不足。二元经济理论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割裂为现代和传统两个部分, 在传统经济部分有大量的剩余劳力, 这些劳力转移到现代经济部分的数量多少, 取决于现代经济部门的投资。④

二元经济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 许多人认为中国城乡是一种二元结构, 笔者认为, 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 在建国初期农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资金, 表明工农业并非割裂的, 笔者曾经计算过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关系数, 发现城镇居民收入高的地区, 其农村居民的收入也高, 这进一步证实中国城乡并非分裂的两个整体。显然由于中国存在悬殊的城乡差距就断言中国是二元经济是欠考虑的。

即使中国是一种二元经济, 刘易斯模式中的几个假设也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 如假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完全就业、假设工资不变等等。毫无疑问, 二元经济论对我们了解问题有极大的启发, 但是并不能据此来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

① M·P·托达罗: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350页。

② 《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第166页。

③ 《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289页。

④ 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综上所述,用比较有影响的人口迁移理论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劳力外流问题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不过也很明显,无论简单套用哪一种理论,都不能圆满地解释问题。

二、1956年与1989年的两次农村劳力外流高潮

早在1956年中国就发生过一次农村劳力外流的高潮,只不过这次高潮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引起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历史时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种相似则有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如果把1956年与1989年农村劳力外流现象加以比较,可以找出以下一些相似之处:

第一,问题都发生在长期的农村劳力大量外流之后。在50年代初期,农村劳力大量外流年年都有,早在1953年4月,国务院就发出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①这也许是“盲流”的词源,不过这一问题并没有进一步发展,政府也没有就此问题进一步发出指示。到了1956年秋后,农村人口外流到大城市和工业建设重点区的现象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状况,使得国务院于当年底发出了“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②并且于1957年初再次发出一个补充指示。^③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农村蕴藏的剩余劳力问题空前尖锐,因此让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得到了理论界的鼓励,地方政府也予以支持,大量农村劳力外流现象再度发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初才发生逆转,“盲流”一词又被重新启用。

第二,对于农村劳力外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的认识基本一致。对1956年农村劳力外流的不利影响的看法是:(1)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2)影响社会治安;(3)增加铁路运输压力。^④除了影响农业合作化的说法在1989年不复存在外,其余几点在1989年初的报刊上比比皆是。

第三,对于解决农村劳力外流的办法出奇地相同,都是提倡用劝阻的办法把农民送回农村。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设立劝阻站,劝阻和遣返外流农民。^⑤1989与1956年的作法基本一致。

由于1989年农村人口外流发生在年初,而1956年发生在年底,因此要比较发生农村劳力外流情况的背景就必须了解1956年与1988年的情况。1956年与1988年在许多方面是极为相似的。

第一,在农村劳力大量外流之前,都发生了较严重的自然灾害,1956年农田受灾面积为2219万亩,为1949—1956年间的第二位的高年份,仅略低于1953年的2342万亩。^⑥1988年农田成灾面积2394万亩,^⑦为80年代以来受灾最严重的一年,1988年农田成灾面积比1987年增加20.9%。

第二,都处于一个城乡生活差距相对扩大之际。由于缺乏历年城乡居民收入资料,仅能以居民消费水平比较。1955年工农消费水平之比(以农民为1)为2.47,1956年升至2.53。1987年为2.54,1988年升至2.68。^⑧

第三,都处在一个城市化高速进行时期。1951年—1956年中国城市数目从156个增加到174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汇编,1953年》,274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年7—12月》,225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7年1—6月》,101页。

④⑤ 同③。

⑥ 《中国统计年鉴1981》,201页。

⑦ 《中国统计年鉴1990》,389页。

⑧ 同⑦,290页。

个, ①增长了11.5%, 城市非农业人口从3355万人增长到5138万, ②增长了53.1%。相应地, 1983年—1988年间, 中国城市从271个增加到432个, 增长了59.4%, 城市非农业人口从1.08亿增加到1.40亿, ③增长了30.7%。

第四, 两次农村人口外流高潮都发生在一个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后的紧缩期前夕。195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为161亿元, 1957年降为151亿元, 降了5.97%; 1988年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2713亿元, 1989年降为2535亿元, 降了6.54%。④

第五, 1956年和1988年底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国家都要加强宏观控制。1956年正处于农村合作化高潮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88年底正是开始实施宏观紧缩时期。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 1956年与1989年两次农村人口外流高潮的种种相似之处显然意味着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内在机制, 而且这些机制并非人口迁移理论所能解释的。

三、农村劳动力外流原因探讨

显然需要从社会和经济结构来探讨中国农村劳力外流问题, 这种结构分析的层次应界于社会变动论、二元经济论这些宏观理论与推拉理论、期望收入理论这些微观理论之间。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国农村劳力外流时有以下几个结构性问题值得重视:

1. 土地问题

在旧中国, 农村劳力外流是长期存在的问题,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中, 农村人口问题关键在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人多地少, 存在剩余劳力, 另一是土地分配不公, 大量贫苦农民无地或少地。据30年代对中国离村农民的调查, 在离村农民中, 42.4%的人拥有的耕地不足5亩, 30.7%的人拥有6亩—10亩耕地, 二者合计占离村农民的73.1%, ⑤由此可知拥有土地的多少对农民离村有一定影响。

关于土地与农民流入城市问题之间的关系, 早已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 有人指出拉丁美洲的高速城市化与该地区土地高度集中有关。⑥毫无疑问, 当代中国农村劳力外流也与农民与土地之间关系松弛有关。

建国后通过土地改革消除了土地分配不公问题。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削弱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这可能是诱发当年年底农民外流的一个因素。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加深了农民与土地的联系, 不过由于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 农民与土地间的关系仍不十分紧密。1984年以后, 农民从种植业中获得的收入基本上停滞不前, 如果按可比价计算产值, 以1984年为100, 1985年则为98.0, 1986年98.9, 1987年为104.1, 1988年只有103.9, ⑦这种状况必然会削弱农民对经营土地的热情, 使其一有机会就脱离土地。

2. 灾害问题

中国有2亿多农户, 也可以说有2亿多个生产单位, 这些小而分散的农户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 又加上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几乎是刚起步, 所以一遇灾害, 农民自我救援能力

① 陈潮:《中国县市区资料手册》, 地图出版社1986年版, 第203页。

② 笔者根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1949—1984年全国市人口一览表》中资料推算。

③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

④ 《中国统计年鉴1990》, 157页。

⑤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 三联书店1957年版, 第887页。

⑥ S·H·波莱斯頓:《农村向城市净移民的国际比较》, 《控制人口与发展经济(二)》, 北大出版社1985年版。

⑦ 《中国统计年鉴》, 335页。

极低。在中国历史上由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农民外流屡见不鲜，建国后也有一些，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河南省因灾害而自流的人口达120万，^①约占当时全省人口的2.5%。

1956年与1988年的自然灾害虽然不及三年困难时期，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两年都是连续几年较好气候条件之后的一个受灾高峰年，这些无疑促成了农村人口外流。

3. 宏观经济波动

中国的户口政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控制吃商品粮的人口，城市发展政策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因此劳动用工政策受上述两个政策的制约，用人单位往往不能招收从农村来的工人为正式工人，一般从农村来的工人在企业中的用工形式为临时工和短期合同工。这是最低层次的用工，时常享受不到社会保障，一遇到宏观经济波动，企业生产不景气，农村来的临时工和合同工立即有被裁减的可能。

当城镇把一度被其吸纳的农村劳力拒之门外，那些脱离了农村受了城市生活影响的人，并不一定能重新适应农村生活，他们有的滞留城市，有的回到农村后又再次返回城镇找工作，造成了所谓“盲流”大军。

中国的宏观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变动，其内在机制超出了本文的探讨范围。本文只是要指出自从开始改革以来的十余年间，我们已经经历了1985年和1989年两次治理整顿，产生了两次规模不同的经济波动，每次整顿都对在乡镇企业中工作的农村劳力产生巨大影响。与1984年相比，1985年乡镇企业减少8.05万个，与1988年相比，1989年乡镇企业减少5.4万个。这些关停并转的企业的职工的再就业问题显然与农村劳力流入城市有关。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概括说，中国的广大农村由于人多地少，广泛地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力，形成一支潜在的外流劳力大军。由于农民与土地间的关系松弛，又因为小农经济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性，所以一遇到天灾人祸，大批农民外流就很难避免，这是导致农村劳力外流的第一个结构性因素。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首先遭受打击的是已经在企业中工作而很少享受保障的农民，使他们重新回到农村，这批人中的多数将再次寻找工作。这是第二个结构性因素。显然，1956与1989两年，正是因为两个结构性因素重叠，加剧了农村劳力外流问题。

四、结束语

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发展的阶段，一个高速城镇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力离开土地和农村的过程是必然要发生的，而我们所希望的是这个过程能为社会所承受，其不良影响尽可能地减少。为了防止再次出现1989年初农村劳力外流高潮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几点是值得认真加以探讨的：

第一，寻求加深农民与土地联系的途径，从根本上扭转农业徘徊局面。

第二，加速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提高农民抗灾能力。

第三，合理保障已经在各类企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当宏观经济波动时，负责安排其生活出路。并且认真研究为什么许多到城市工作过的农民不大愿意回到农村，提出相应对策。

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如果有突破，无疑会有助于防止今后再次出现农民外流浪潮。

责任编辑：王 颖

^① 甄琦：《中国人口·河南分册》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